

国明显在经历一个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战略的转移。<sup>①</sup>

中国已经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更多地集中于有质量的增长。这种重心的转移要求经济结构的重建和生产与消费类型的改变,尤其是在能源生产与消费领域。

在2016年3月举行的低碳发展蓝皮书发布会上,齐晔教授估算,中国的碳消费总量很可能在2013年就已达到顶点。服务业自2012年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部门。他还强调了消费类型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基于编制年度性低碳发展评估报告的研究表明,转向消费很可能是中国走向低碳发展的最有效方法。<sup>②</sup>

环境雄心与社会福利之间的交换 可持续发展目标语境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同时应对节能减排要求和对于经济重建背景下大量能源产业工人失业威胁的不断增加的关切。如,来自煤矿的大众性抗议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增加了。

欧洲国家在经济重建过程中曾经历了长期的工人罢工浪潮,尤其是1980年代后期的英国。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能是抽象的,并时常因为其含义模糊而遭受诟病。然而,它的多向度视角或许可以提供某些帮助,以便平衡对经济重建政策与环境和社会关切的考量。

地方层面上的落实 尽管中国倾向于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议程设置,但她也给各种形式的地方探索预留了巨大空间。地方层面上的经验,比如低碳城市、低碳社区试点和省市层面上的排放交易平台建设,或许可以提供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域决策的有益思考。然而,环保与社会福利领域的大量新法律和规章的落实,亟需基层层面上的大规模能力建设与培训,以便在次国家层面上创造出必要的结构、刺激和意识。

走向社会与生态概念和运动的融合 可持续发展承认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必要性。随着生态向度的引入,这一概念增加了一种新的政策认知倾向,即或者仅仅强调经济增长,或者仅仅强调社会平等。

交叉性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连结不同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潜能,以便促进不同层面上的合作治理。当代精英与国际外交机构之所以赞成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着眼于那些能够扩大不同政策共同体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理解的观点。如今,试图确定环境新社会运动(“绿色运动”)和传统的劳工运动(“红色运动”)之间联系的努力,也已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sup>③</sup> 探讨可持续发展议题话语的多样化,也许是中国和其它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肥沃土壤。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构成了使可持续概念在各个国家中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当然,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可持续发展目标话语将会更多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中国和其它国家中的本地性话语。

## 可持续发展与发展替代语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李全喜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任何一种范式革新意义上的话语都会构成一种统摄性的“话语语境”(discursive context),从而对更具体性的相关学术理念或话语的学理阐释和实际应用产生一种背景性或总体性影响。可以说,“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与“发展替代”(alternative to development)就是这样两种颇为不同的范

① 参见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参见齐晔《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低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③ Qinzhi Huan “Development of the red – gree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5/3(2014) pp. 45 – 60.

式革新性的话语,并构成一种特定的理论言说与认知语境,那么,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上述两种话语语境的契合度分别如何,尤其是,“发展替代”理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讨论有什么启迪呢?

20 世纪中期之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出了经典性阐释,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应当说,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是对工业化时代以消耗煤和石油等主要能源的“黑色”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并倡导将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协调起来。这一发展理念着力于使现代化进程彰显出公平性、可持续性、共享性、和谐性等特征,并使人类的道德关怀的对象范围从传统的人际之间拓展到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尤其是强调人类代内与代际间的互利共生。这样一种新型发展理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令人困惑的是,该理念提出后的 30 年来,世界上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缓和或消除,而是在许多方面和更大程度上恶化了。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的解读和认知有一定关系。在理论层面上,多年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大都拘泥于一个抽象性的概念或表面化的口号,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意涵本身缺乏一种更深入的探讨。比如,众所周知的可持续发展所关切的三个向度: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与环境可持续,那么,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究竟是并列性关系还是依次主导性关系,抑或是其它什么关系?对此,都缺乏深入明确的探析。同时,必须承认,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议题的讨论过度受到经济 GDP 主义的影响,或者说一种更加统摄性的“发展”话语的影响。在这样的话语语境下,很难说所讨论的可持续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或有助于环境可持续性?或者说,讨论的对象到底更多属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范畴还是环境可持续性的范畴?在实践层面上,许多情况下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依然在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落实,突出表现为人们习惯于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总任务进行分解分配,从而缺少了可持续发展应该有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实践特征。

同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人们对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仍缺少进一步的研究,在现实中甚至还普遍存在着把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知,主要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身也关注环境可持续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到底有没有区别呢?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生态文明建设。在笔者看来,环境可持续关注并不能与生态文明建设划等号。因为,可持续发展话语中内涵着的环境可持续,体现的是如何在不突破自然生态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更关注在一种新型生态自然观的引领下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宗旨;从基础支撑体系上,可持续发展更强调理念层面上的变革,而生态文明建设更突出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可持续发展话语语境下并不能充分或准确阐发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旨,前者实际上指的是环境可持续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人们尝试提出所谓的“发展替代”理论来对(可持续)发展话语语境及其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反思。显然,发展替代理论是针对发展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而言的。发展替代理论不是对之前的发展理论的直接继承,相反,它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后发展”或“去发展”理论,是一种对发展的终极目的、基本方式、主要内容、评价指标、客观影响等侧面进行的理论反思。比如,迪特·森哈斯的《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佩鲁的《新发展观》、戴维·瓦尔德纳的《国家建构与后发展》、吉尔伯·李斯特的《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都对发展话语本身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批判和反思。

除此之外,学界最近还出现了诸如“后增长”、“去增长”、“替代性发展”等一些新的关于发展的理论。比如,美国学者丽贝卡·霍伦德(Rebecca Hollender)认为,在历经数十年尝试实现环境和社会目标

失败后,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被大大弱化甚至遭到拒绝,因为当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平等和环境问题的根源。<sup>①</sup>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论述中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是与可持续发展精神背道而驰的,即商品化倾向、对持续增长的依赖、不平等的倾向、经济语境的普遍化、资本主义去道德本性及其对社会规范的渗透。这五个基本特征所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因此,要实现后增长就必须放弃经济增长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霸权地位,也就呼唤强有力的政治干预和公众监督。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所阐发的这样一种发展替代话语,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生态文明建设时给予关注。与可持续发展话语语境不同,发展替代话语语境似乎可以更好地揭示生态文明建设所呈现出的一些新特征:其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所出现的新变化。发展替代语境更容易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已经从过去的经济增长时代转向环境保护时代,人们已经从温饱诉求逐渐转向生态质量诉求。其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支撑理念所出现的新变化。发展替代语境更容易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社会制度体系的重建式变革而不简单是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道德理念的革新或微型调整。其三,生态文明建设中所需要的政府更为突出的功能或角色。发展替代语境更容易阐明,生态文明建设尤其需要一个绿色民主政府的总体规划与政策落实方面的牵引功能,而可持续发展语境下对此的定位还不够清晰。其四,生态文明建设中所需要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主体。发展替代语境更容易阐明,与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对单一的主体构成不同,生态文明建设更需要或强调其主体构成的多样性,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民主和自主地位。总之,在一种发展替代的话语语境下,似乎更容易理解和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意味着:生态环境考量在社会发展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人们对生态权益的诉求更加受到关注、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领功能更加突出、公众自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更加显著、制度体系的改革与重建尤其是政治层面上的变革更加更要,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保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已成为关系到民生福祉与民族未来,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疑,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理论,应该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但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序幕刚刚拉开,在这样一个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诸多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笔者认为,相较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替代话语似乎更能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探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提供一种论证,并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推进中一些特别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一,发展替代理论倡导消除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经济社会制度根源,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平等享有普惠的生态福祉,而这就意味着根除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消费关系和国际关系。其二,发展替代理论强调生态社会性变革中的制度重构与重建的重要性,也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与体制创新意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然离不开法制保障,但生态文明意义上的法制建设首先是理念与体制的创新,需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相关法规、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全新的制度法规,从而确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政治革新性质。其三,发展替代理论彰显了政府在生态社会性变革中的引领与主导功能,也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动力机制构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与支持,要求政府能够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与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其职能范围和增强其政策执行能力,也就是努力建设一个有能力的“环境国家”。其四,发展替代理论关注绿色转型过程中公众主体参与的重要性,也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群众主力军的角色定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根本性推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因此,如何才能有效激发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激情、有效动员其加入到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来,才是决定整个进程快慢的关键性因素。需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发展替代理论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sup>①</sup> Rebecca Hollander, "Post - growth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emergence of 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9/1(2015)。

义,但显然还不能说,它就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对于后者,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进一步挖掘阐发中和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中概括提炼出来。

##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的反思

杨志华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自2007年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评价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学者们展开了各种类型的生态文明量化评价课题研究,产出了诸多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学者们提出的各类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就不下40套。在诸多的生态文明评价研究当中,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时间较早且持续进行,成果较彰且不断完善,渐成体系且影响较广,因而是较有代表性的。然而,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因此也还存在诸多不足。笔者在此以北京林业大学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为例,做一些批判性思考,以期对完善生态文明评价研究有所启发。

从2008年开始,北京林业大学在国家林业局行业公益性课题资助下,开展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及信息系统技术研究,最终提出了一套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包括4项二级指标、22项三级指标,并根据国家发布的权威指标数据,采取相对评价法,逐级加权求和,测算得出了各省份2003~2008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得分,也就是生态文明指数(ESI),并展开了进步率分析、类型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深度探讨。该研究成果最终以生态文明绿皮书的形式发布,即《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SI2010)》。此后,又在不断修改完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逐年发布生态文明绿皮书,目前已发布了2015版,共6部,测算的结果则是从2003~2013年,共10年。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得到学界认可,曾获得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学术成果奖,是该研究领域被广泛参考的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生态文明绿皮书的基础上,北京林业大学以严耕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2014年又申报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经过努力,课题组创建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从18项具体指标数据上的年度进步度,来测算各省份在生态保护、环境改善、资源节约和排放优化方面的进展,采用相对评价法,进而加权求和得出各省份的生态文明发展指数(ESPI),并同样展开了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类型分析、态势分析和驱动因素分析等深度探讨。目前该研究项目已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2014》。

如果说生态文明绿皮书是对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静态评价,那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则着眼于对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进步状况及发展态势展开动态评价。由此,我们已经能够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我国各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较为全面的科学评估。尽管如此,综观这个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及其指标体系,笔者认为,至少在六个方面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第一,指标数据发布未能与评价研究形成良性互动。科学评价的基础是指标数据,而目前的可获得数据尚不能充分满足评价的要求。比如,生态文明评价理应纳入的有些指标无统计数据,有些省份的年度数据缺失,有些指标的数据缺乏时效性,五年一次发布甚至十年一次发布,有些数据因统计口径变化导致数据出现异常变动。总之,受制于可获得数据,评价研究结果大打折扣。课题组曾企望通过评价来促进数据统计工作的不断改进,但目前仍不理想。

第二,评价对象选择容易失当。到底应该按什么标准来划定评价对象,多大范围的评价对象最合